

女性天才与西方基督教历史^①

Female Genius and Western Christian History

【英】艾莉森·贾斯珀 著 张靖 译

Alison JASPER

132

Abstract: Though women's lives have been fragmented in ways analysed very acutely by Simone de Beauvoir in 1949, I argue they have not merely suffered but sometimes have dealt creatively with this fragmentation; sustaining forms of resistance, tradition and connection in limiting circumstances. I argue tha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gloss over these instances of women's creative management in limiting circumstances but to try to do full justice to women who have struggled to become human subjects at some cost. Not to do so, is to exclude and belittle women all over again. Using philosopher

^① 本文是在另外一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参 Alison Jasper, "Female Genius: Jane Leade (1624—1704),"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ew Interdisciplinary Spaces*, ed. Heather Walton (Farnham, Surrey, 2010).

Julia Kristeva's idea of female genius, I try to find a way of acknowledging this achievemen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obstacles women have undoubtedly faced. In this lecture, I illustrate my point in reference to a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ristian mystic, Jane Leade. In the larger project I have looked in detail at further examples.

Keywords: Simone de Beauvoir, Julia Kristeva, Jane Leade, female genius, history of English women.

“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宗教”^①

一、《女性天才》课题简述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许会将基督教当作可“轻易抛弃的历史垃圾”^②。笔者却无法走到这种极端并抛弃整个传统，尽管这不是因为笔者认为纯粹的人类学或人文学角度无效。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剥削女性及其他人群有着结构性原因（如阶级和经济原因）^③。笔者还接受这样的观点：这些剥削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9.

^② Boer & Øklund,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22.

^③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术成果总结参见，Roland Boer and Jorunn Økland, eds.,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8), 1—25.

性的结构经常以基督教的名义保存下来了。与此同时，笔者感觉我们依然有必要说明某些女性个体之思想与行为。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宣称，正是基督教激励了她们，让她们打破性别传统习俗的障碍并反抗各种明显的男权压迫形式。因为这个原因，笔者无法完全赞同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说法：西方女性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没有宗教^①。确实，女性的生活已经裂成了碎片，“散落于男性生命之中，通过住房、家务、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与某些男人（比如父亲或者丈夫）捆绑在一起，她们与男性的这种联系比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更为牢固”^②。但与此同时，女性并不仅仅只在承受苦难，她们有时在受限制的环境中很有创意地应对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并保存了反抗、传承及联系的各种方式。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质疑男权统治，我们很有必要不去掩盖女性生命的灿烂，不能以为她们在这些限制性的环境中注定最终会失败。在笔者看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不是她们的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冰冷的安慰，而这些女性一直在努力思考、写作或讲述她们的故事，并在付出一些代价后获得她们的主体性。笔者希望能在无需忽视她们毫无疑问面临的困难的前提下找到一种方式认识并承认这些女性的贡献。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以简·利德（Jane Leade）为例说明这一观点。在笔者从事的更大的课题研究中有更多的例证并且论述更深入^③。

^①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9.

^② Ibid.

^③ 参见 Alison Jasper, *Female Genius And Feminist Theology: Four Historical Cas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Waco, TX, 2011). 本书即将出版。笔者还考察了其他三位女性的生命与工作，她们是：汉娜·莫尔（Hannah More, 1745—1833），茉德·罗伊登（Maude Royden, 1876—1956）和米谢勒·罗伯茨（Michèle Roberts, 1949—）。

波伏娃的分析认为，男性已经成为一种标准。这个分析本身表明，女性的渴望（female desire）被边缘化了，而这就造成了女性碎片化的生活感受。女性的渴望是能更好地生活、更快乐并能更自主地决定她们是谁以及她们要做什么。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渴望即便被边缘化了依然能找到表述的方式，而且如果我们睁大眼睛就可以看到女性所表达的这些愿望。如果我们以为，在波伏娃选择了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写作《第二性》时，她是第一位大声表述了女性愿望的女性，那么我们的想法就愚不可及。波伏娃并不是凭空（ex nihilo）创造了一个女性的角度。她的作品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为女性渴望提供了新的定义，让女性可以在面对不可否认的困难时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承认，但是她所说的肯定是在她之前的女性所理解和认同的观点。即便以前没有女性主义理论知识，也肯定不能阻止女性意识到她们仅仅因为性别而被禁声、忽略和蔑视。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以及整个英语国家的政治运动以及喧嚣和有时暴力的抗议活动中^①，这一点很容易阐明。虽然波伏娃观点的狭窄逻辑停留在女性被禁声的状态，她的作品是另外一个故事的明证。她没有被她自己的狭窄逻辑限制住，或者说她不是总被其限制的^②。她分析并且帮助解释了女性在男权制中被制约的状况，而且她将女性环境或状态当作一个严肃的哲学主题来对待。正是在这样的写作活动中，

^① 参见 S. J. Kleinber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45 (American History in Depth)* (New York, 1999) or Jane Purvis, *Women's History: Britain 185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1997).

^② 比如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Sue Anderson）认为，波伏娃有时会受一些规范性的成规习俗的限制。参 Pamela Sue Anderson, 'The Lived Body, Gender and Confidence', in *New Topic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ontestations and Transcendence Incarnate*, ed. Pamela Sue Anderson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2010), 163—180.

她努力给女性一个更强大的声音，并因此增加了影响社会和改革文化的机会。

但是，波伏娃思想的光芒有时会让我们看不到一个更为复杂却可能较少负面影响的图景。尽管波伏娃表达了改变的愿望，我相信这与在她之前的女性们一致。但她们中不是所有人都在以波伏娃同样的方式想象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比如，与许多晚近女性主义者类似，波伏娃认为基督教是造成女性问题的部分原因。她的“男性是一种标准”的分析经常被用来批评基督教的神圣结构、机构化权威及各种压迫形式^①。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女性并不总是感觉基督教是障碍，尽管她们中有些人也许已经将自己委身于“错误的信仰”^②。

在从事有关女性圣经诠释批评的博士研究工作时，笔者首先想弄明白，以这种方式来解读波伏娃思想所暗含的女性在西方和基督教历史的悖论性缺失/在场。那时，我开始认识到同时存在的两种努力。那个时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圣经做出了解读，聚焦于圣经的“恐怖文本”，即指出在圣经记载针对女性的恐怖暴力故事以及在圣经文本中女性被还原为物体之时，圣经系统性地压制了女性声音（女性缺失）。与此同时，其他女性主义圣经批评家们

^① 玛丽·戴莉 (Mary Daly) 写过两本与此主题有关的经典著作，参 Mary Daly: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 (Boston, 1968); *Beyond God the Father* (Boston, 1973).

^② 波伏娃运用了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Jean Paul Sartre) 的概念——“错误的信仰” (bad faith, 又译自欺)，以此来解释男性如何将压迫行为理性化以及女性如何接受了被压迫：“必须承认，男性发现在女性中找到共谋比压迫者在被压迫者中找到共谋要容易得多。他们通过错误的信仰从压迫中获取权威并宣称她早已渴望得到他们强加给她的命运……她欣然地让自己期待保护、爱、帮助和其他人的管理，她让自己沉迷于不劳而获的自我实现的希望中。她错误地屈服于诱惑；但是男人并没有资格去谴责她，因为他引领她走入诱惑中。” 参 Beauvoir, 730.

和神学家们也在奋力记录圣经女性作为行动与话语主体的在场性。美国学者菲丽斯·翠柏 (Phyllis Trible) 在其著作《恐怖的文本》(Texts of Terror, 1984) 的每一章都竖起一座墓碑, 来纪念那些从圣经文本中被切割出去的女性; 而伊丽萨白·舒斯勒·菲奥伦莎 (E. Schussler Fiorenza) 的奠基性作品《纪念她》(In Memory of Her, 1983) 则平衡了这种企图。伊丽萨白·舒斯勒·菲奥伦莎的作品通过阅读和修改从大利拉 (Delilah)^① 到叙利腓尼基妇人 (Syrophenician Woman) 等等活泼、鲁莽又令人惊叹的圣经女性故事来让女性作为主体在场。

因此, 笔者希冀能公平对待男权体制中女性被压迫及女性富有适应力和创造力这两个方面。女性的这种适应力和创造力支撑了整个西方基督教历史。此外, 因为笔者不接受那种“粉饰太平”的媒体宣传, 认为女性现状整体上来说“不再有问题”, 笔者相信针对女性的研究工作对当下和未来的女性一直有着重要意义。

正如笔者前文所言, 波伏娃的分析认为女性主体是偶然的、无关紧要并且是典型的“他者”^②。这一精辟分析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起点, 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论化并且进行彻底全面的思考。她的问题“女人是什么?” 一直与我们这个充斥着大量技术革新、经济与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时代保持着相关性。这个时代固定的性别理念或“传统的”性别角色不断被人们讨论。同时, 笔者挑战

^① 另外还有巴尔 (Mieke Bal) 在《死亡与不相称: 〈士师记〉中的连贯政治》中的解读。巴尔质疑传统的“连贯一致性” (coherence), 因这种“连贯一致性”将大利拉这个圣经人物当作一种狡诈的“蛇蝎美人” (femme fatale)。巴尔把大利拉读为一个智谋师, 帮助苦恼的参孙找到他自己内心的“连贯一致性”。参见 Mieke Bal, *Death and Dissymmetry: The Politics of Coherence in the Book of Judge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②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6.

一种人们从波伏娃的作品中获得的有关女性的看法，这种看法还广泛反映在西方媒体中：在西方民主体制中，女性在现在这一代之前从来没有积极地追求去实现自己设计的重要人生目标。我要挑战这一看法，因为它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支持一种标准的男性观点，认为主要是男性（总体来说西方男性）决定了所有至今仍有影响的人类大变革进程的方向。相反，笔者试图提议，女性的影响也许超出了男权或女性主义极端思想通常所允许的范畴。这是一个复杂的假设，几乎无法同时全面去讨论。在本文中笔者拟为与基督教有关的臆断说几句好话。这种观念认为基督教扮演了父权制角色，在历史长河中绝对成功地管制和压制了女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将运用另外一位哲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批评工具来探索女性作为有创造性的人类主体这一观点。结合本文的处境，笔者特别选择她的“女性天才”概念。

二、女性天才

在西方历史中，“天才”总是如此紧密地与男性之阳刚特征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谈论“女性天才”时总觉得有些古怪的“不搭调”（mismatch）^①。很明显，这个问题中有人试图回避的东西，而“天才”两个词被放入了引号内。克里斯蒂娃和在她之前的波伏娃一样^②，认识到要称呼一位女性为“天才”，就要确立一位女性的主体地位，确立女性不是男性恐惧或渴望的对象。这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要处理的中心问题。用波伏娃的话来说：

^① Christine Battersby, *Gender and Geniu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9), 78.

^②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22—723.

“只要她还在努力挣扎去成为一个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① 结果，在波伏娃写作时，她将神话、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作合谋对付她和她所代表的整个性别的假想敌。她并不总是能看见，在她的写作及她所构想的概念中，她自己已经设法获得了主体地位。

克里斯蒂娃认同波伏娃的观点，认为成为一个人并拥有一个主体地位是一场斗争，但是她不赞同波伏娃狭隘的逻辑立场，不认为这是一场毫无结果或女性不可能获胜的斗争。但是克里斯蒂娃同时也理解这中间依然存在着问题。对克里斯蒂娃来说，这个建立主体地位的过程本身就是天才的工作：“一位天才的工作在主体生成之时达到顶峰。”^② 换言之，成为主体^③不是某种天才能够被嫁接的初步过程。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努力，或多或少成功地复兴、震惊甚至重塑人类生存状况^④，而天才（如波伏娃自己）也能因为这些事情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当克里斯蒂娃称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心理分析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作家兼 20 世纪名流科莉特（Colette）为女性天才之时，她并不仅仅指这类原因。相反，克里斯蒂娃如此称呼她们是因为一个事实：她们在这些领域选择主体性地位而且从未隐藏她们的女性情感、欲望或者挣扎。当然，在一个以男性为标准的世界做一名女性，突出的困难是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女性大多被认为不过某些男性的追随者或者门徒。因此，“女性天

^①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23.

^② Julia Kristeva, *Hannah Arendt*, trans. Ross Guber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x.

^③ *ibid.*, xi.

^④ Kristeva, *Hannah Arendt*, xi; Julia Kristeva, *Colette*, trans. Jane Marie Tod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07.

才”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特性 (uniqueness) 或者特点 (singularity)^①, 包含、质疑并重新定义传统上对女性的理解以及人们对女性能够或不能做什么的理解。

克里斯蒂娃通过革新我们对“女性天才”的理解挑战了波伏娃对天才的华丽描述^②以及她对女性解放的理想化描述, 这两点在当前的环境中都无法达到^③。在克里斯蒂娃眼中, 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落入了波伏娃自己在别处强有力抨击过的标准和价值观。克里斯蒂娃另辟蹊径去发现另一种可能性, 试着在女性通常所做之事以及她们可能特别擅长 (或者更有可能不擅长) 的事情中寻找天才。也就是说, 她给我们展示了天才诞生的确切背景以及天才所取得成就的种类, 而这些以前都被认为太女性化、太不重要而被人们忽略。当然, 我们有必要指出, 这不是某种暗度陈仓重新将女性边缘化的方法。在一个尚未变革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中, 很容易生产无实质内容的男女平等假象。我们都很熟悉这种论调, 认为女性 (以及男性) 在持守他们的传统角色时生活最幸福。这种男女的传统角色常常因为此类原因而被合法化, 但其实是建立在生物决定论 (biological determinism) 的基础上, 曾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猛烈批判^④。这种论调不可避免地在掩饰或者无法认识到这些传统角色如何为一个很明显的父权制谋划 (agenda) 效劳。

在克里斯蒂娃将母亲推举为“女性天才”之时, 她指的是工作的母亲们。让她震惊的是, 这些母亲不断被人们指手画脚地评

① Julia Kristeva, *Colette* (New York, 2005), 404.
② Beauvoir, *Second Sex*, 722. 比如“那些已经提出要在人类个人存在中重新制定全人类命运的人”。
③ Beauvoir, *Second Sex*, 724.
④ Beauvoir, 35—69, ‘The Data of Biology’.

断：“做一位母亲和女性的方式有时被热烈地接受，有时被完全拒绝或者交织着矛盾，但这赋予了母亲们完全属于她们自己的天赋。”^① 在渴望成为一位母亲却又不希望被母亲身份局限时，女性通常都要挣扎，因为做母亲同时又做另外一个人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位工作的母亲不得不努力反抗人们对母亲的规范性期待，这种期待不可避免地盛赞一种角色（女性及母性的）而贬低另一种角色（阳性及非母的）。根据克里斯蒂娃的思路我们得出新的“天才”定义：一位工作的母亲可以通过追求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乐趣而成为天才，她无需给那些激励她奋斗的渴望贴上标签，无需点明哪些是“合适的”女性渴望或哪些是“不合适的”男性渴望。

认识到女性在抵制各种性别的成规旧识或性别限制所取得的成就之后，克里斯蒂娃据此批评了波伏娃对特雷莎修女（Mother Theresa）和科莉特（Colette）等女性生命的评价。她认为，波伏娃只是利用这些女性来举例说明女性环境的限制性，没有在这些限制之外给与她们任何赞扬。对克里斯蒂娃来说，这些女性是“展示她们天赋的榜样”^②。她认为波伏娃只用这些女性的故事来佐证自己有关女性生存状态的分析，没有承认她们作为单个的主体在如此有限的环境中所取得的成就。克里斯蒂娃指责波伏娃非常不公地忽略了“每个女性自由地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或女性的“个体自主性和女性创造性”^③。与此相对，克里斯蒂娃争论道，她的三位女性天才——阿伦特、克莱因和科莉特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展示了她们的自由”或“无须听从主流思潮、机构、党派或

^① Kristeva, *Arendt*, xv.

^② Kristeva, *Colette*, 406.

^③ Kristeva, *Colette*, 406.

者学派而去探索的自由”^①。换言之，尽管不易，她们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有丈夫情人或没有、可以使用自己独创的词汇、制定自己的计划等等，她们因此改变了她们居住的世界。尽管克里斯蒂娃在某些方面批评波伏娃，但她最终承认波伏娃出版的作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强化并重新定义了与女性生存现状有关的问题——女性毫无疑问被父权文化的要求所限制。意义深刻的一点是，克里斯蒂娃在自己有关女性天才的三部曲之第三卷结束之际将这个三部曲献给了波伏娃。^②

但是，克里斯蒂娃基本上还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她认为女性正慢慢地从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限制^③中被释放出来，因此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比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人可能认为她过于乐观了，不能充分意识到在接纳她的法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被边缘化的女性困境。确实，对克里斯蒂娃来说，女性的主体地位问题从根本上是一个哲学或者心理语言学问题，而不是建构并理解性别差异的问题。她并不让自己卷入一些紧迫政治问题之中（如为同工同酬而战或反对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然而，她对“女性天才”的重新定义有其政治内含。它瞄准男性规范社会之“想象”，让在所有结构和机构中运作的、排斥一切的父权制谋划（agenda）无处藏身。

三、一位女性天才——简·利德（1624—1704）

尽管女性经常是边缘化和男性统治的牺牲品，但不是所有女

^① Kristeva, *Arendt*, xix.

^② Kristeva, *Colette*, 407.

^③ Kristeva, *Arendt*, xii.

性都只是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命运。比如在简·利德的这个例子中,女性有时会以有创意的方式来应对父权文化的碎片化及压迫,尽管人们可能没有公开认可这种方式。在这个部分,笔者拟继续挑战另外一些对女性生存状态并无裨益的观念。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如果同情认可基督教就是在“错误的信仰”中行动,或仅仅因为某些女性还没有被人们广泛记住就认为她们已经失败(即便她们并未因此而受责备)。因此,简·利德不被认为是一位有天赋的天才作家,其作品不能进入西方描写神圣事物的严肃文学经典,上面的原因可以解释利德的这种“失败”(至少在几个世纪中是如此)。这可能只是父权制将女性边缘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我们如果这样设想就比较合情合理:利德正在做着与克里斯蒂娃的“女性天才”概念很接近的事情,她挑战了传统的“女性应该依附于男性”或女性应该“听从其他人的判断”的认识^①,她不断增强自己的信心,坚持自己的观点,忽略作为女性环境强加给她的限制。

现在让我们比较详细地回顾一下简·利德的生平和工作。1640年,16岁的利德有了一次突然而剧烈的基督教信仰认信经历^②。她说服父亲允许她在伦敦的已婚哥哥家住了六个月。在伦敦她积极地体验了众多教会,寻求精神上的支持^③。这些都显示出一个年轻女性的独立心灵。正如许多证据表明,这个时期她也试图说服她的双亲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嫁人。但是20岁时她开始了父母为

^① Mary Astell,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Profess'd by a Daugh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705), 6, as quoted in Dale A Johnson, *Women In English Religion: 1700—1925* (New York & Toronto, 1983), 15—16.

^② Julie Hirst, *Jane Leade: Biogaphy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Mystic*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16—17.

^③ *Ibid.*, 18.

她选择的传统婚姻生活。她嫁给了威廉·利德，这段婚姻看不出幸福。但是她的属灵自传表明，1660年代早期她已经开始感受到环境的限制，并经历了她认为是神圣的异象（vision）^①，这些异象挑战了她的家庭生活的范畴和资源，给她的渴望和奋斗提供了新的目标。

1670年利德的丈夫去世时，她突然发现自己从这段婚姻中解脱出来了。她似乎一直抗拒每一种友善和好意的再婚提议（她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不愿再被拖回到家庭的狭小环境中^②。这一次她把关注她所看见的异象和发展神学放在第一位。波伏娃在《第二性》^③中尖锐地指出过，女性若能维持受传统限制就能够得到不少物质益处，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需求与渴望，利德似乎已经完全准备好舍弃这些物质利益。她认为这些渴望及她被呼召去从事的工作对她意义重大。不论别人如何揣测她的选择（她的已婚女儿就认为她毫无远见！）^④，她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她只愿与那些允许她去追求她自己的愿望、去做她感觉被呼召去做的事情的人同行。她的行动不再会只为了使得自己和家庭生活更容易。

1696—1701年她的属灵日记《园中之泉》（A Fountain of Gardens）出版之时，简被称赞为伦敦非拉铁非协会（Philadelphian Society of London）的异象领袖。那时她已是一位在欧洲享有声誉、

^① Julie Hirst, *Jane Leade: Biography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Mystic*, 25.

^② *Ibid.*, 28.

^③ Se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21. “Man-the-sovereign will provide woman-the-liege with material protection and will undertake the moral justification of her existence; thus she can evade at once both economic risk and the metaphysical risk of a liberty in which ends and aims must be contrived without assistance... she is often very well pleased with her role as the Other.”

^④ Julie Hirst, *Biography*, 28.

著作等身的女性。她没有按照当时社会习俗的限制性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生活，而是选择了做一位神秘主义神学家，重新捡起她少女时期的梦想。在那个时代，创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普救主义神学异象。

利德作品中的一些主题也反映了利德对环境限制的创造性回应。她凭借女性天才对基督教上帝进行了独特的描述^①。比如，在《园中之泉》中利德将索菲亚（Sophia）当做一个神学比喻（theological trope）。这一处理非常复杂。她在冗长而精致的语句中织入不同的形象，让这些句子很难懂，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形象很有生命力和感性，很适合大声朗读，因为只有出声朗读才能显露其文本中的节奏和韵律格式^②。当然，她的思考属于某一神学传统，特别反映出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雅各·伯麦（Jacob Boehme）的影响^③。伯麦早期所运用的索菲亚形象取自圣经和次经智慧文学，是上帝创造性话语的女性拟人形象。然而，尽管受伯麦原则的影响很深，利德有自己的观点和异象，她所强调的索菲亚比伯

^① Most references will be to *A Fountain of Garden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696—1701 in three volumes, and which contains a series of actual and spiritual visions she had experienced and recorded twenty years previously. In this text, she describes the journey of her soul and the processes of its illumination and purification Julie Hirst, *Biography*, 41.

^② See also on this, Catherine F. Smith, “Jane Lead: Mysticism and the woman Clothed with the Sun” in Gilbert, Sandra & Susan Gubar (eds), *Shakespeare's Sisters: 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Bloomington, 1979).

^③ Ultimately, Hirst notes that Leade departs significantly from Boehme o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predestination adopting, from the mid 1680s a concept of universal salvation, authority for which she claimed ‘as a prophetess revealing God’s will’ and going beyond either scriptural sources or previous ‘authorities’ such as Boehme. See Julie Hirst, *Biography*, 116.

麦的更强烈，而且神学上更具探索性^①。

利德在扩展圣经中的雅各与利百加故事^②时堆积了许多让人晕眩和混乱的意象与暗喻。比如，她把自己看成利百加，她为她的丈夫以撒预备可口的佳肴，而这是从她的长子以扫那儿骗取长子权计划的一个部分。在另外的时刻，她把自己看成利百加的爱子雅各，要从母亲直接的策划中获利。有时她把自己看成孩子，雅各做汤时宰杀的牺牲品，而这些暗指她将自己作为献祭品奉献给上帝的经文援引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以及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Paschal Lamb）的形象。

利德的感情（sentiment）对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显得非常陌生。但很明显，她以一种非常自信的方式走进经文，而她精心建构的暗喻表明她能够想象、思考、建构一些东西，这些思想超越了传统所认为的女性所合适的角色或能力。比如，很特别的一点是，她认为自己和雅各一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却是被拣选的那位。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要在这个很明显由男性占据主要地位的世界取得成功，选择被神意支持的、自命不凡的雅各以及他足智多谋的母亲利百加来作为她的神圣眷顾人是

^①See Julie Hirst, *Biography*, 7. According to Hirst, Leade uses Sophia, not an image that figured largely in more conventional Christian writing of the period, consciously and creatively as a theological tool Sophia is:

- Preserver and revealer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 Mother and maternal guide or teacher of those who belonged to her spiritually supervising their rebirth and entry into the covenant of the Philadelphian Community.
- The bride with whom humankind was destined for spiritual marriage
- Divine Queen and consort

Divine principle implanted into humanity that predestined them for perfection.

See also Julie Hirst, *Biography*, 62.

^② See *Genesis* 27.

多么恰当啊！^①

我觉得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暗喻以及她使用这些暗喻的方式表明她意识到了传统用性别来区分和塑造人的方式，但是与此同时也展示了她如何有能力超越这些传统习俗的限制，去塑造新的代表人物。这种新的代表形象直接回应了她的渴望。她渴望用自己的术语获得更多的理解。

四、结论

总之，利德是 17 世纪的女性个例 (singular)，她的文学成就和其他女性作品一起可能不被西方那个时期框定为可接受的、有关神圣的严肃写作的男性认为值得阅读。我很清楚，直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女性的自由和创造性有限，这种认识耗尽了无数女性和少女的创造性能量并消灭了她们的生命。但笔者对这个事实感兴趣：依然存在像简·利德这样的女性，将毕生生命奉献给写作，她们不是单纯地折射男性的标准和期望，而是很明确地为她们自己和一个也许很小但坚定奉献的阅读群体写作。利德在她的基督教作品中创造了新的思想和人际、人神关系，这些思想来自她自己的阅读和异象经验，来自她与心灵相通的人的交谈。这样就孕育了女性天才，很含蓄地抵制了有关女性能力的质疑并且对波伏娃的问题“女人是什么？”做出了新的回答。在规范性的男性世界中女性的能力永远不会完全被吞没。我已经提出，我们不能忽略和遗忘结构性父权体制的后果，不能允许这些后果来抹杀女性在生养孕育和发明创造等众多领域中所拥有的独特的创造性。利

^① 尽管在她的解释中利德在传统基础上为以扫丧失合法继承权做了“合理性”解释。传统认为以扫等同于身体的尘世生命。

德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女先知、女性异象家和女作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并且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女性在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中的一种恒久且有创造性的在场。这种在场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被世界认真思考和接受，而不仅仅是维持统治结构的例外个案。这种在场应该作为女性写作传统的元素被人们接受，因为这些元素有着带来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神学转变的潜能。

作者简介：艾莉森·贾斯珀，英国斯特林大学。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Alison JASPER,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Email: roland.t.boer@gmail.com

译者简介：张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ANG 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ngjingwise@gmail.com